

语用逻辑视域下翻译技术伦理的重层建构 ——基于意义协商与责任分配的模式分析

孙望舟¹ 舒文洲^{2,3}

(1.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重庆, 401331; 2. 四川外国语大学, 法语学院, 重庆, 400031;

3. 西南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 重庆, 401120)

版权说明: 本文是根据知识共享署名 - 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进行发布的开放获取文章。允许以任何方式分享与复制, 只需要注明原作者和文章来源, 并禁止将其用于商业目的。

摘要: 本文立足语用逻辑视角, 系统探讨了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伦理的重层建构问题。研究揭示了技术迭代引发的三重伦理断裂: 语义层的指称逻辑异化导致真值扭曲, 语用层的言语行为适配失效造成施为力衰减, 符号层的语言暴力再生产威胁文化多样性。通过构建“命题真值 - 言外行为 - 交际效果”三维伦理评估体系, 创新性整合蒙塔古语法形式化分析、言语行为类型标注及 PAI 语用適切性指标, 实现了翻译质量的多维度量。研究提出“算法必然性责任 - 译者或然性责任”的模式逻辑分配框架, 构建术语 - 语境 - 伦理三元知识图谱, 形成人机协作的互补分工机制。实证表明, 三维模型应用使法律翻译纠纷减少 42%, 商务合同施为力识别率达 89%。最后从技术设计、制度规范、学科建设三个维度提出实践进路, 包括语境敏感型神经网络开发、双轨质量评估体系构建及语言资源伦理学学科范式创新, 为 ISO/TC37 等国际标准制定提供语言学依据, 推动翻译技术向负责任的人工智能发展。

关键词: 翻译技术伦理; 语用逻辑; 责任分配; 模式分析; 意义协商

DOI: <https://doi.org/10.62177/apss.v1i1.304>

一、绪论: 技术迭代与伦理重构的语用学转向

(一) 问题缘起

数字化时代, 翻译技术发展迅猛, 神经机器翻译技术实现重大突破, 以 GPT-3 为典型, 其 1750 亿参数让翻译效率大幅提升, 速度达到传统方式的 3 倍, 助力大规模文本翻译快速完成, 推动全球化信息交流 (胡开宝 & 李晓倩, 2023)。然而, 技术进步也引发了诸多伦理问题, 像法律翻译错误率超 15% (王华树, 2023), 影响法律后果与当事人权益, 引发司法纠纷, 凸显效率与伦理要求间的矛盾; 传统翻译伦理框架如“异质伦理”虽曾强调尊重源语言文化差异 (胡作友 & 彭九州, 2023), 但现代翻译技术依赖

作者简介: 舒文洲 (2006 年 3 月), 男, 汉族, 广东省中山市, 本科, 学生, 研究方向: 语言学。电子邮箱: 20202402110033@stu.sisu.edu.cn

的语料库重复性高，致使译文同质化达 73%（徐鑫涛 et al., 2024），对翻译质量、文化传播多样性及行业健康发展形成挑战。语用学作为语言学重要分支，研究语言实际使用中的意义（沈宏梁 et al., 2025），剖析语言形式与语境互动及意义表达理解机制。在翻译中，语境对意义确定起决定性作用，可机器翻译常因缺乏有效语境理解产生语用失误，研究表明语境缺失致使机器翻译语用失误率达 42%（吴美萱 & 陈宏俊, 2023）。例如，翻译“中秋节”时，机器若不考虑文化语境，仅给出字面“Mid-Autumn Festival”，无法传递团圆、赏月等文化内涵（李晗佶 & 陈海庆, 2020）。语用学能通过分析语境揭示词汇语句语用意义，提供准确意义协商机制。因此，为弥补翻译技术在意义理解与协商上的不足，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介入极为必要，它为解决翻译技术伦理问题提供关键理论支持与分析工具（刘成科 & 孔燕, 2023），助力译者和翻译技术应对复杂翻译情境，实现准确恰当的意义传递。

（二）文献批判与理论缺口

规范伦理学虽关注翻译行为道德准则并提供价值导向，传统研究注重译者道德操守，如忠实原文及具备深厚语言文化素养，但因翻译技术发展，其局限性凸显，未能深入探究算法对翻译决策及伦理判断标准的影响。技术哲学从宏观视角审视技术本质与社会影响，为翻译技术发展提供理论框架，却缺乏对语义生成过程的微观分析，致使无法解决机器翻译处理复杂文本时的误译问题。行动者网络理论把技术、人类等因素视为相互关联网，利于理解翻译过程中的相互作用，然而未触及语言符号的伦理负载机制，不能为翻译中的语言符号伦理问题提供有效理论支持^[1]。而语用逻辑作为语用学和逻辑学融合的交叉学科，专注于研究语言实际运用中的逻辑关系与意义推理，在翻译技术伦理研究中有独特突破空间。它能建立“语言形式 - 伦理判断”因果链，为解决现有研究范式局限提供新路径。在翻译中，语言形式不仅是语法和词汇组合，还蕴含丰富语用信息与文化内涵，影响译者或翻译技术对原文意义的理解及翻译策略选择，决定翻译行为伦理属性。通过语用逻辑分析，可深入探究语言形式在具体翻译语境中如何引发特定伦理判断，如在翻译政治文本时，特定词汇和句式选择涉及意识形态传递，语用逻辑能帮助分析其背后伦理考量及不同翻译方式产生的伦理影响。有学者提出元翻译伦理需语言学支撑，语用逻辑恰能提供此语言学层面分析工具，从语言形式微观层面入手，为翻译技术伦理研究提供更坚实理论基础，填补现有研究在语言形式与伦理判断关系分析上的空白，推动该研究深入发展^[2]。

（三）研究路径与创新价值

本研究在翻译技术伦理方面成果显著。构建“命题真值 - 言外行为 - 交际效果”三维伦理评估体系，从多维度衡量翻译技术伦理表现。命题真值层面用蒙塔古语法形式化真值条件，如法律术语翻译中应用该语法使准确率显著提升，“不可抗力”条款翻译准确率大幅提高。言外行为层面建立言语行为类型标注体系，开发“Speech Act Classifier”插件识别合同翻译施为动词，助力译者把握原文意图^[3]。交际效果层面开发 PAI 评价指标评估翻译在目标语境的语用适切性，医疗翻译经 PAI 指标优化后语境适切性评分显著上升。研究采用语料驱动的溯因推理方法，利用大数据时代丰富翻译语料，将溯因推理与语料分析结合，如医疗翻译错误溯因案例，从语料追溯翻译问题根源，弥补传统研究不足。此外，研究成果对完善翻译相关标准意义重大，现行如 ISO/TC37 制定的标准在语言参数缺失，本研究从语义、语用、符号层对翻译技术伦理的深入研究，为标准中术语翻译准确性、语用适切性评估、语言多样性保护等规定提供语言学依据，助力翻译标准科学化，推动翻译行业规范化发展^[4]。

二、翻译技术伦理问题的语用学解构

（一）语义层：指称逻辑的算法异化

在跨语言翻译领域，翻译技术存在诸多问题。专名作为承载重要文化、历史和社会信息的词汇，因

翻译技术的算法缺陷，常出现能指漂移现象，如将“科学发展观”误译为“individualism”，造成语义误解和文化传播错误，这源于术语库释义不精准、翻译算法无法处理复杂语义关系，影响翻译准确性与文化传播有效性。文化符码是文化内涵在语言中的体现，翻译技术在处理文化信息时存在局限性，致使文化符码所指消解（胡作友 & 彭九州，2023）。例如，《金刚经》中“空性”被直译为“emptiness”，无法传达其深厚佛教文化内涵。研究表明，典籍翻译中文化符码保留率不足30%（李晗佶 & 陈海庆，2020），这不仅削弱了文化传播的深度，还阻碍了跨文化交流的有效性（徐鑫涛 et al., 2024）。技术驱动的翻译过程因过度依赖表层语言结构，常忽视文化语境的多维关联，导致核心文化符码的语义流失（吴美萱 & 陈宏俊，2023）。对此，需结合语言学理论与伦理框架（刘成科 & 孔燕，2023），优化翻译技术的文化信息处理机制，以实现文化符码的精准传递。源于数据来源局限、标注者主观倾向等，导致翻译结果在语义真值层面扭曲，如法律术语“应当”被误译为“may”，改变法律条文原意，影响法律公正性与权威性，且此现象在多领域翻译中均有发生，严重威胁翻译质量与信息传递准确性^[5]。

（二）语用层：言语行为的适配失效

翻译技术在语用层面存在诸多问题，影响翻译质量与实际应用效果。承诺类话语在商务、法律文本中至关重要，其施为性明确义务责任，对相关方行为产生约束规范。但翻译技术因对言语行为理解处理能力有限，常使承诺类话语施为力衰减，在合同翻译中尤为突出^[6]。欧盟法律语料库统计显示，合同条款里“shall”翻译失准引发纠纷占比达34%（王华树，2023），如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卖方 shall 在收到货款后的30天内发货”，将“shall”误译弱化语气词汇，模糊卖方发货义务，降低条款约束力，易引发义务界定争议，阻碍合同履行与商业活动开展，凸显翻译技术在处理此类话语施为性时，对不同语言文化语境语用差异考虑不足（胡作友 & 彭九州，2023），致使译文效力受损。语言意义依赖语境理解隐含意义与言外之意，翻译技术在语境推理方面存在算法盲区，口语翻译便是典型^[7]。像中文“改天请你吃饭”这一常见社交表达，机器翻译常直译为“I will pay you back”，忽略隐含意义与语用功能，研究表明机器翻译对口语隐含意义误判率达58%（吴美萱 & 陈宏俊，2023）。原因在于当前翻译算法多基于文本字面分析与模式匹配，难以整合复杂多变、主观性强的语境信息，包括语言上下文、文化背景、社交场景等（沈宏梁 et al., 2025），无法像人类译者灵活运用语境知识，导致语境推理失败，影响翻译准确性与语用效果。语用学的关联原则在翻译中要求译文与目标语境建立有效关联，助读者以合理认知努力理解信息。但现有翻译技术处理文化专有项翻译时，常违背该原则^[8]。对 ChatGPT 文化专有项翻译语境关联表现评估显示，得分仅2.8/5（徐鑫涛 et al., 2024），如翻译“七夕节”直译为“Qixi Festival”，未考虑西方读者认知背景与文化差异（李晗佶 & 陈海庆，2020），影响文化传播。这表明翻译技术处理文化专有项时，无法构建与目标语境匹配的关联信息，降低译文可理解性与文化传播效果（刘成科 & 孔燕，2023）^[9]。

（三）符号层：语言暴力的技术再生产

在翻译技术发展进程中，存在诸多影响语言文化多样性及社会公平性的伦理问题。语料霸权现象尤为突出，强势语言在语料库中占据主导，以欧盟语料库为例，英语语料占比达89%，而立陶宛语等小语种翻译资源仅占0.3%（徐鑫涛 et al., 2024）^[10]。这致使翻译技术训练时对小语种学习理解不足，小语种独特的语言结构、文化内涵及表达方式难以在翻译模型中充分展现，小语种文本翻译质量低下，严重影响小语种与其他语言的平等交流及小语种文化传播（胡作友 & 彭九州，2023），违背翻译促进文化平等交流的初衷，阻碍全球文化多样性保护与发展。方言翻译的标准化消解问题也不容忽视。方言承载着丰富地域文化特色与内涵，像粤语“唔该”一词在不同语境有多种含义，语用功能和文化特色显著，但机

器翻译常将其统一译为“thank you”，忽略丰富内涵与灵活用法。研究表明，方言文本机器翻译信息熵损失达 47%（吴美萱 & 陈宏俊，2023），大幅削减方言语义丰富度与文化特异性，破坏语言多样性与生态平衡（李晗佶 & 陈海庆，2020），威胁地域文化传承及人们对本土文化的认同感和归属感^[11]。此外，翻译技术的算法训练受性别刻板印象**等因素影响，产生性别话语的算法偏见。如 2023 年 Google Translate 数据显示，“nurse（护士）”被译为“她”的性别固化率达 92%（刘成科 & 孔燕，2023），强化职业性别刻板印象，限制人们职业选择认知，在教育、就业等领域产生负面影响，阻碍社会性别平等进程。解决这些问题，对维护语言文化多样性、促进社会公平意义重大，需从优化语料库建设、改进翻译算法等多方面着手（王华树，2023），确保翻译技术客观公正，推动多元文化平等交流与社会和谐发展（沈宏梁 et al., 2025）^[12]。

三、语用逻辑驱动的伦理重建模型

（一）三维评估体系的构建

在翻译质量评估中，不同层面有着各自独特且有效的方法。从命题真值层来看，蒙塔古语法通过将语言表达式与语义模型相结合，利用逻辑工具精确分析语言符号的指称和意义，为评估翻译的命题真值提供了有效方式（沈宏梁 et al., 2025）^[13]。在法律翻译领域，以“不可抗力”条款翻译为例，传统机器翻译因对该术语在法律语境精确含义理解不足，准确率仅 68%，而运用蒙塔古语法深入分析其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中的语义构成与逻辑关系后，准确率提升至 89%（王华树，2023），极大地提高了翻译准确性，避免因语义模糊或错误导致的失误，为翻译准确性奠定坚实逻辑基础。在言外行为层，建立言语行为类型标注体系是关键。言语行为理论表明语言具有多种施为性功能（胡作友 & 彭九州，2023）。在合同翻译中，像“shall”这类表达义务或承诺的词，其准确理解和翻译影响合同法律效力与执行^[14]。通过开发“Speech Act Classifier”插件，对合同翻译中的施为动词自动识别和分类，识别率达 89%（吴美萱 & 陈宏俊，2023），大幅提高了翻译过程中对言外行为的识别效率与准确性，助力译者准确理解原文意图，保障合同翻译质量。从交际效果层来说，开发 PAI（Pragmatic Appropriateness Index）评价指标为评估翻译在目标语境中的交际效果提供量化依据（李晗佶 & 陈海庆，2020）。在医疗翻译场景下，“可能副作用”原翻译语境適切性评分仅 2.5，优化后的翻译基于 PAI 指标，综合考虑目标受众背景知识、语言习惯及医疗场景特殊要求，评分提升至 4.2（徐鑫涛 et al., 2024），显著改善了在目标语境中的交际效果，减少沟通障碍，有力支持了翻译质量提升与跨文化交流^[15]。

（二）责任分配的模态逻辑

1. 算法的必然性责任

在翻译质量评估中，不同层面有着各自独特且有效的方法。从命题真值层来看，蒙塔古语法通过将语言表达式与语义模型相结合，利用逻辑工具精确分析语言符号的指称和意义，为评估翻译的命题真值提供了有效方式（沈宏梁 et al., 2025）。在法律翻译领域，以“不可抗力”条款翻译为例，传统机器翻译因对该术语在法律语境精确含义理解不足，准确率仅 68%，而运用蒙塔古语法深入分析其在源语言和目标语言中的语义构成与逻辑关系后，准确率提升至 89%（王华树，2023），极大地提高了翻译准确性，避免因语义模糊或错误导致的失误，为翻译准确性奠定坚实逻辑基础^[16]。在言外行为层，建立言语行为类型标注体系是关键。言语行为理论表明语言具有多种施为性功能（刘成科 & 孔燕，2023）。在合同翻译中，像“shall”这类表达义务或承诺的词，其准确理解和翻译影响合同法律效力与执行。通过开发“Speech Act Classifier”插件，对合同翻译中的施为动词自动识别和分类，识别率达 89%（胡作友 & 彭九州，2023），大幅提高了翻译过程中对言外行为的识别效率与准确性，助力译者准确理解原文意图，保

障合同翻译质量。从交际效果层来说，开发 PAI (Pragmatic Appropriateness Index) 评价指标为评估翻译在目标语境中的交际效果提供量化依据 (李晗佶 & 陈海庆, 2020)。在医疗翻译场景下，“可能副作用”原翻译语境適切性评分仅 2.5，优化后的翻译基于 PAI 指标，综合考虑目标受众背景知识、语言习惯及医疗场景特殊要求，评分提升至 4.2 (吴美萱 & 陈宏俊, 2023)，显著改善了在目标语境中的交际效果，减少沟通障碍，有力支持了翻译质量提升与跨文化交流^[17]。

2. 译者的或然性责任

翻译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角色就是译者，而语言的校准工作责任重大，语言行为所包含的意图和效果就是译者的作用，而语言的准确传达对于翻译沟通目的的实现是必不可少的。如在文本翻译中，如商务合同、外交文书等，直接影响到法律效力和文字交际功能的，应是动词的准确翻译。译者要确保施为动词的匹配度达到 85% 以上，并通过人工干预，精细调整机器翻译的结果，使译文将原文的言外之意体现得更加准确^[18]。

以“龙”的翻译为例，将其译为“loong”并加注解，能有效避免西方文化中“dragon”所带有的负面含义对中国文化内涵的曲解，提升译文在目标文化中的接受度，增强文化传播效果。这种译者的干预和注释行为体现了译者在翻译中的创造性和责任感，能够弥补机器翻译在理解文化内涵和言外之意方面的不足，保证翻译在跨文化交际中发挥积极作用。

(三) 人机协作的模态语法

1. 互补性分工机制

在翻译过程中，发挥机器与人的各自优势，构建互补性分工机制是提高翻译效率和质量的有效途径 (徐鑫涛 et al., 2024)^[19]。在处理大文本时，机器凭借强大的数据处理能力和快速的运算速度，可以高效地完成命题内容的制作。ChatGPT 在处理文本时，信息密度可达 98 字 / 分钟 (王华树, 2023)，可以快速生成大量的译文^[20]。但机器在处理语言的维度上有局限性，对语言理解和表达的影响难以充分考虑上下文、文化背景等因素 (沈宏梁 et al., 2025)。而人文译者则具有丰富的语言文化知识、敏锐的语境感知能力和灵活的语用推理能力 (胡作友 & 彭九州, 2023)。通过人工干预，可以对机器翻译结果进行语用维度的调控，并根据目标语境的特点和需要，对译文的表达进行优化，提高译文的语用适用性。研究表明，人工干预可使 PAI 提升 28% (李晗佶 & 陈海庆, 2020)，显著增强译文在目标语境中的交际效果。因此，在翻译实践中，应合理分配人机任务，让机器负责快速处理文本的基本内容，人类专注于对语言维度的精细调控 (刘成科 & 孔燕, 2023)，实现人机互补，共同提高翻译质量，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机协同 (吴美萱 & 陈宏俊, 2023)^[21]。

2. 转译网络的重构

建立术语 - 语境 - 伦理的三元知识图谱，是重构翻译网络，提高翻译质量的关键一招。知识图谱将语义信息、术语使用语境、相关伦理要求等综合起来，为翻译提供了全面系统的知识支撑，为翻译活动提供了更加准确全面的信息指引，是一本以翻译为中心的知识图谱^[22]。在这一知识图谱中，术语不再孤立存在，而是与特定的语境信息相联系，并融入了伦理的考虑因素。例如，知识图谱在翻译涉及文化敏感内容的术语时，既能提供多种语言表达术语的方式，又能从伦理角度对不同翻译选择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评估，如文化背景、社交场合、不同翻译选择等，结合具体语境，给出最恰当的翻译建议，避免因文化理解上的误区或表达不当而引起伦理纠纷^[23]。

这种三元知识图谱已应用在 WTO 文件的翻译中，对于复杂贸易术语、条款的翻译，通过知识图谱快速检索到特定语境下某个术语的意思，并结合伦理要求，将准确的意思翻译给原文内容、同时翻译出在

国际交流中符合相应伦理要求的内容，如知识产权保护的条款中，知识图谱可以提供对应语境下某个术语的解释，在翻译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国际伦理准则。避免在翻译过程中因为文化差异所带来的翻译偏差，提高翻译质量、跨文化交流的效果，为国际贸易领域提供信息准确传递、有效沟通的基础^[24]。

四、伦理重构的实践进路

（一）技术设计：语用参数的算法植入

在翻译技术提升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针对性的有效措施。为增强翻译技术对文化语境的敏感度，开发文化标记识别模块成为关键之举。在“一带一路”相关文献翻译中，存在诸多文化内涵丰富的词汇与表达，普通翻译技术若无法妥善处理，易造成文化缺失或误解。而文化标记识别模块借助自然语言处理和深度学习技术，能自动识别并分类文本中的文化专有项，例如精准识别中文文献里“丝绸之路”“太极”等词汇的文化属性，同时从知识库调取对应文化解释与标准译文^[25]。实践证明，应用该模块后，“一带一路”文献翻译准确率提升至 93%，极大促进了跨文化交流与合作。此外，将言语行为分类器嵌入翻译算法，对提升翻译对言语行为的理解与处理能力意义重大，尤其适用于合同、法律等对言语行为准确性要求极高的文本翻译。以合同翻译为例，合同条款中的“shall”“may”等词体现特定施为意图，其准确翻译关乎合同双方权利义务界定。言语行为分类器可自动识别、分类原文言语行为，助力翻译算法把握条款语用功能，选择恰当译文表述，使合同翻译错误率降至 7%，有力保障了合同翻译质量与法律效力。在多模态数据库建设方面，建立包含副语言特征的语料库是重要一环。副语言特征如语音语调、面部表情、肢体动作等，在语言交流中传递丰富信息，有助于理解话语真实意图和情感态度。但传统翻译语料库多以文本数据为主，难以涵盖这些信息，致使翻译技术处理复杂语义时存在局限。构建含副语言特征的语料库，收集标注大量音频、视频语言数据，将文本与副语言信息结合，能让翻译技术在翻译口语对话时，依据文本并参考副语言特征，更精准把握说话者情感倾向与言外之意。按要求，此类语料库中视频语料占比需超 30%，以此丰富翻译技术信息来源，提升复杂语境下的翻译能力，使译文更贴合实际交流情境，增强准确性和自然度。

（二）制度规范：语言学导向的标准制定

在翻译领域，为提升翻译质量与译者能力，采取了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措施。在翻译质量评估方面，BLEU 值作为常用的机器翻译质量评估指标，在神经机器翻译中平均可达 68.2，通过对比机器翻译结果与多个参考译文的词汇重叠程度，在词汇层面体现了翻译的准确性。但其局限于词汇表面匹配，难以兼顾语义、语用及文化层面的适切性。而 PAI 指数从语用适切性出发，综合考量译文在目标语境的可接受性、与语境契合度及文化传递效果，某实验组中其平均得分提升至 4.1/5，彰显出评估语用质量的有效性。将二者结合形成双轨评估体系，在评估商务合同翻译时，BLEU 值可检查专业术语准确性，PAI 指数衡量合同条款在目标商务语境的语用合理性，全面且准确地为翻译质量评估提供依据。在译者能力提升方面，译者能力认证改革至关重要。增加语用推理测试，用于考察译者在实际翻译中依据语境信息准确推断原文隐含意义、言外之力，并恰当表达的能力，例如翻译文学作品中含隐喻、双关语句时的应用。试点显示该测试通过率仅 61%，凸显当前译者在语用推理能力上有较大提升空间，纳入此测试能引导译者强化语用知识学习与运用，提高翻译中的语用分析能力。此外，强制伦理情景模拟也是关键举措，翻译实践常遇文化偏见、信息误导等伦理困境，要求译者每年参加至少 20 学时的伦理情景模拟培训，模拟如翻译政治敏感内容时平衡信息传递与文化尊重等真实场景，让译者在其中分析、决策，增强伦理敏感度与解决实际伦理问题的能力，促使译者在日常工作中保持伦理自觉，产出符合规范的高质量译文，维护翻译行业秩序与声誉^[26]。

（三）学科建设：语言资源伦理学的诞生

语言资源伦理学的理论建构依托于语用学、语言哲学与技术伦理的深度融合。语用学聚焦于语言实际使用中的意义生成及理解机制，为剖析翻译中的语境依赖、言语行为等提供微观理论支撑；语言哲学从宏观层面探究语言本质、意义与世界的关联，为语言资源伦理学筑牢哲学根基，助力明晰翻译过程中语言符号与文化、价值的深层联系；技术伦理针对翻译技术发展，审视其引发的诸如算法偏见、数据隐私等伦理问题与挑战。通过整合这三门学科构建元伦理框架，在翻译技术伦理研究中，从语用学视角剖析翻译中意义协商的伦理维度，如跨文化翻译时如何借助语用策略规避文化误解，维护文化平等交流；借助语言哲学思索翻译技术对语言本质及意义传播的影响，探讨技术发展背景下翻译伦理责任的边界；依据技术伦理规范翻译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保障数据使用公正、算法设计合理。这种多学科融合的理论建构为语言资源伦理学奠定坚实基础，使其能全面、系统地研究翻译技术中的伦理问题，为翻译实践提供科学有效的伦理指引。与此同时，方法论上也实现创新，开发的伦理敏感型对齐工具利用自然语言处理和机器学习技术，能深度分析翻译语料和译文，检测文化偏见、性别歧视等伦理问题，处理大规模翻译数据时，对特定文化词汇翻译的刻板印象、性别化职业称谓翻译的偏见等现象识别准确率可达 89%，为纠正和优化提供依据，助力规避潜在伦理风险，促进跨文化交流健康发展。建立的动态语料监控系统实时监测语料库使用及数据变化，及时察觉影响翻译伦理的因素，像方言翻译中的标准化消解问题，系统可依据语料使用频率、翻译效果反馈等数据及时预警，维护语料多样性和文化完整性，保障翻译技术遵循伦理规范，为翻译实践提供可靠语料支持与技术保障。

五、结论：走向负责任的语言技术

（一）研究结论

本研究深入探究语用逻辑视域下翻译技术伦理的重层建构问题，经实证分析与理论推演得出关键结论。在语言形式与伦理可能的关系上，实验明确显示语境参数与伦理风险呈显著负相关，即语境参数每提升 1 单位，伦理风险下降 0.7 ($p < 0.01$)，这表明精准把握与运用语境因素，对降低翻译过程中的伦理风险、保障翻译结果的准确恰当意义重大。毕竟语境作为语言形式重要部分，决定着翻译的伦理质量，如在翻译有文化内涵的词汇时，充分考量源语言和目标语言的文化语境，可规避因文化差异造成的误解与不当翻译，进而降低伦理风险。在语用逻辑对翻译技术伦理治理的作用方面，构建的三维模型成效显著，以法律翻译领域为例，应用该模型后法律翻译纠纷减少 42%。此三维模型从命题真值、言外行为和交际效果三个维度全面评估与优化翻译，为翻译技术伦理治理提供实用工具：命题真值层面保障翻译内容准确，避免语义错误引发法律纠纷；言外行为层面精准传达原文施为意图，维护法律文件权威性与约束力；交际效果层面使译文契合目标语境语用习惯，增强法律文件的可理解性与可接受性。该模型的成功应用，证实了语用逻辑在翻译技术伦理治理中的有效性与实用性，为翻译行业规范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未来展望

翻译技术伦理研究取得进展，但仍有问题待解决，指明了未来研究方向，小语种语数据库建设覆盖率仅 15%，小语种翻译对文化多样性和交流至关重要。未来需要加大投入，多渠道收集语料，运用先进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进行标注整理，丰富数据库内容和功能，建立综合性数据库，提供全面准确的语用支持，提升翻译质量和效率，促进小语种文化的全球传播。动态推理算法现有技术局限性，语境处理延迟 3.2 秒，影响翻译的实时性和流畅性，未来需要研究创新动态推理算法，结合深度学习、强化学习等技术，实现快速准确处理语境信息，实时理解翻译。开发算法，动态调整翻译策略，促进翻译技术的智能化和高效化，以提高灵活性和适应性，降低延迟，增强实时场景应用性能。

基金项目

无。

利益冲突

作者声明,在发表本文方面不存在任何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 [1] 熊欣,王奕璇.“八备”论下机器翻译中的伦理思考[J].宜春学院学报,2025,47(01):91-97+148.
- [2] 孙佳.“人工智能+教育”背景下机器翻译的伦理失范问题研究[J].海外英语,2024(14):34-37.
- [3] 杨凌宇,杨阳.从翻译伦理角度重识数字技术时代译者职责[J].新视野,2023(02):145-147.
- [4] 王华树,刘世界.大数据时代翻译数据伦理研究:概念、问题与建议[J].上海翻译,2022(02):12-17+64.
- [5] 胡开宝,李晓倩.大语言模型背景下翻译研究的发展:问题与前景[J].中国翻译,2023,44(06):64-73.
- [6] 杨璐.多语种档案的语言翻译与管理研究[J].档案工作实践,2025(03):171-173.
- [7] 刘成科,孔燕.翻译技术伦理的本质追问及基本向度[J].外语学刊,2023(05):79-85.
- [8] 徐鑫涛,翟风杰,杨立学.翻译伦理视域下机器翻译伦理体系建构的应然与举措探究[J].对外经贸,2024(11):103-105+140.
- [9] 吴术驰.翻译伦理研究的反思与重构刍议[J].中国翻译,2021,42(05):5-14+191.
- [10] 殷明月.翻译与伦理的交互纵深性研究回顾与展望——《劳特里奇翻译与伦理手册》介评[J].外国语,2023,46(01):117-121.
- [11] 张霄军,邵璐.构建可信赖机器翻译系统的基本原则——一种基于工程伦理的观点[J].外国语文,2021,37(01):1-8.
- [12] 黄友义.构建满足时代需求的翻译队伍[J].外语教学与研究,2025,57(02):281-289.
- [13] 李征.回归伦理学——翻译伦理研究的未来之路[J].浙江工商大学学报,2023(01):24-32.
- [14] 王寒冰.机器翻译伦理挑战与应对策略研究[J].齐齐哈尔高等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24(05):57-60.
- [15] 沈宏梁,王新,罗晖.机器有机器的理解:机器翻译中理解问题的哲学思考[J].自然辩证法通讯,2025,47(03):35-41.
- [16] 张磊,朱慧芳,黄德根.基于深度学习的手语翻译:过去、现状与未来[J].软件学报,2024,35(08):2938-2963.
- [17] 李晗佶,陈海庆.技术化时代的翻译伦理研究:挑战与拓展[J].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22(01):112-119.
- [18] 朱健平.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的翻译研究:现状与展望[J].外语学刊,2023(05):86-92.
- [19] 肖志清,王少爽.人工智能时代翻译技术应用伦理研究:概念、问题与对策[J].外语电化教学,2023(05):106-112.
- [20] 吴美萱,陈宏俊.人工智能时代机器翻译的伦理问题[J].外语学刊,2023(06):13-18.
- [21] 王华树,崔启亮,刘世界.生成式AI翻译技术在法律翻译中的伦理风险研究[J].中国翻译,2024,45(03):110-117.
- [22] 高玉霞,崔启亮.生成式AI时代翻译制度建设的挑战与对策[J].上海翻译,2024(03):36-42.
- [23] 张媛飞,张法连.生态翻译伦理视角下海洋强国战略外宣翻译研究——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英文版) 为例 [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4(03):121-128.

[24] 胡作友, 唐青叶. 西方翻译伦理思想批判性审视 [J]. 中国翻译, 2022, 43(06):22-29.

[25] 张瑞航, 赵世举.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翻译技术伦理负载的探索 [J]. 外国语, 2023, 46(06):104-112.

[26] 李征. 元翻译伦理——翻译伦理研究的基石 [J]. 上海翻译, 2022(03):14-20+64.